

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郭廷以、王聿均、黃嘉謨、李毓澍為例*

蘇維新**

史家如何書寫「自己國家的歷史」，反映該時空背景下，史家對其國家、民族的認識與想像。「中國近代史研究」（1840-1949）此一新興學門在「科學治史」的方法論外，也承載史家對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情懷。1949年後，學者隨中華民國政府東渡來台，也將「中國近代史」學門的研究傳統帶至臺灣。1955年，郭廷以應中研院院長朱家驊之邀，籌備「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該所籌備、成立（1965）初期，以近代政治、外交史為主要研究範疇，肩負國際學術交流（福特基金會、哥倫比亞大學等），以及「與

* 本文討論四位對中國近代史領域有卓越貢獻的學者，但為求行文客觀，一律不加「教授」、「先生」等敬稱。拙文初稿撰寫與發表過程，感謝林文凱教授、任天豪教授細心指證諸多觀點上的錯誤，方始文章雛型得以形成。投稿過程，兩名匿名評審教授在觀點、題目與標題、遣詞與格式均提供諸多建議，筆者已儘可能之修正。但文責仍由本人全權負責。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

復國家民族」之重任，乃為國內近代史學門的領導機構。有鑑於該所的重要性，筆者以郭廷以、李毓澍、王聿均、黃嘉謨為主，分析他們如何認識與想像近代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困境？批判哪些歷史事件與人物？對中國「固有疆域」看法為何？是否呈現民族主義史觀？與官方民族主義的聯繫為何？筆者擬從「學術知識生產」與「民族主義」的視角切入，針對該所草創期的近代通史、中外關係史、邊疆史的研究成果，進行適切的評價。

關鍵詞：中國民族主義、「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前言

(一) 研究背景、動機與文獻回顧

2014年初以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為主軸的「太陽花社運」爆發，使得馬英九政府的民主決策機制遭受嚴峻的考驗。時任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研究員黃國昌為該運動的領導者之一，卻在運動後遭受立委呂學樟批判：中研院是「總統的幕僚機關」，不應帶頭反政府。¹這使得中研院在政府機構的定位受到公共輿論關注，1958年「第三次院士會議」蔣介石總統與胡適院長亦曾對中研院之定位有所歧見：

蔣介石：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標，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則吾人一切努力均將落空，因此希望今後學術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來求其發展。²

胡適：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復國的任務，我們做的工作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³

從蔣胡的爭鋒相對，到當今呂黃的爭議，在最高學術機構中研院服務的學者行使其言論自由，但政治力的介入卻也無所不在。本文討論的要角—中研院近史所開山祖師郭廷以，也曾捲入政治風暴

¹ 〈呂學樟嗆廢中研院 黃國昌轟狂妄闖尾〉，《自由時報》（臺北），2014年05月13日。參考自：<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78515> 2015年01月11日 08:26

² 〈總統期勉學術界人士負起復興民族文化艱鉅任務鞏固倫理道德重建國家〉，《聯合報》（臺北），1958年4月11日，第1版。

³ 轉引自：潘光哲，《天方夜譚中研院：現代學術社群史話》（臺北：秀威資訊，2008），7。

之中，以致晚年被迫避走他鄉。⁴近史所早期研究人員呂士朋、魏廷朝等亦先後遭逢白色恐怖之戕害。⁵事實上，對該所早期發展的相關研究，確實也呈顯其不畏政治干預、追求學術自由的面向：政學關係上，秉持「自由主義」、堅持學術獨立；治學風格上，繼承「蘭克－傅斯年」學派「史料先行」傳統，並運用當時西方社會科學界盛行的「近代化理論」做為研究架構。⁶但若從學術思想史的途徑去思索，外在大環境影響，與內在學派的學術傳統，同樣是影響學術觀點變遷的重要法則。郭廷以等中研院近史所早期學者，在青年時期接連遭遇中日戰爭、國共內戰等國家的「內憂外患」交逼、苦悶的戰爭流亡與受難之經歷，這些外在環境經驗可能激盪出的「民族主義」情感，對他們的學術思想難道未產生任何影響嗎？即便堅稱行使學術自由的胡適，他早年在《獨立評論》、《新月》等雜誌，亦包含若干民族主義的思想。事實上，民族主義思潮被認為是近百年中國歷史發展的最大動力。⁷若沿著近代中國的歷史現場觀察，晚清以來各種激進與保守，改良與革命的思想，就會發現其中均含有對民族主義的關懷。⁸

⁴ 近史所草創時期研究資源匱乏，故郭廷以積極爭取國際學術交流，在 1962-1972 年獲得美國福特基金會補助，使得該所在圖書蒐購、檔案編輯、人員研修均有重大突破。而臺灣政學兩界人士對費正清的敵意，使得郭氏因之捲入白色恐怖政治風暴。以上事蹟均可參考：張朋園，《郭廷以 費正清 章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2-18、25-30。

⁵ 沈懷玉主訪，〈王萍女士訪問記錄〉，收入於陳儀深、黃克武等訪問，《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128-130。

⁶ 潘光哲主訪，〈王爾敏先生訪問記錄〉、〈陳存恭先生訪問記錄〉，收入於陳儀深、黃克武等訪問，《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194-197、309-310。郭廷以的親傳弟子對郭氏的論著多為介紹性質，或其中溢美之詞太過，缺少以學術史/思想史視角的分析。如：王爾敏，〈漫談郭廷以先生與中國近代史之學術建樹〉，《漢學研究通訊》22.3（總號 87）（2003.08），35-44。

⁷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上）〉，《歷史月刊》4（1990.06）：144。

⁸ 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4。

從上述討論可知，既有文獻對近史所早期學者思想的解釋，多半從內在學派的學術傳統解釋，較少顧及外在時代背景—特別是「民族主義思潮」與其學術思想的互動關係。林志宏、陳儀深兩位對郭廷以的個案研究，則填補早期研究上的不足之處。林著以1940年代郭廷以撰寫的《中國通史稿本》為例，指出該著兼有內在學派傳統的「科學實證史觀」與外在時代背景的「國民革命史觀」。⁹陳著則指出郭氏的邊疆史和臺灣史著作，均蘊涵「民族主義史觀」。¹⁰但林著對於郭氏遷臺後的學術思想並未深入探究，陳著則僅針對《臺灣史事概說》內容做分析，其它相關文本則一筆帶過。¹¹因此，本文將進一步闡發和補充兩位學者的研究觀點，並試圖分析「民族主義史觀」和「國民革命史觀」的關聯性。再者，郭廷以和其弟子所開創的中研院近史所，乃為全球「中國近代史」領域的研究重鎮，可惜至今雖有針對郭廷以本人的研究，但對該所早期其他研究人員和組織發展卻少有相關研究。鑒於該所之重要性，吾輩是否應對該所早期研究人員抱以適當關注？因此，本文將以郭廷以，以及他在南京中央大學所收的三大弟子—王聿均、黃嘉謨、李毓澍的學術論著為例，討論「中國民族主義思潮」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關聯性。具體而言，首先將討論「中國近代史」研究此一新興史學領域的創立，為何與民族主義思潮產生聯繫？並以三個次領域為例—「近代通史」、「近代外交史」與「近代邊疆史」，討論郭廷以等人對某些特定「史實」的詮釋為何？使用那些詞彙、敘事手法去描述？是否足以

⁹ 林志宏，〈蔣廷黈、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思與言》42.4（2004.12）：41-81。

¹⁰ 陳儀深，〈從邊疆史到臺灣史：世變下郭廷以史學的一個側面〉，《思與言》48.4（2010.12）：1-22。

¹¹ 陳儀深，〈從邊疆史到臺灣史：世變下郭廷以史學的一個側面〉，1-22；林志宏，〈蔣廷黈、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41-81。

被稱做「國民革命史觀」或「民族主義史觀」？與中華民國政府的「官方民族主義」有何聯繫？而受限於本文篇幅，筆者並無法處理郭廷以等人著作中「民族主義史觀」、「近代化史觀」和史料學派的互動關係，此部分留待其他文章解決。

（二）研究概念與章節安排

從上可知，本文感興趣的議題，與民族主義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有必要對「民族」(Nation)、「民族主義」(Nationalism) 加以定義與限制。關於該詞彙的界定與研究，歷來在不同學術領域均累積豐碩的成果。本文屬於歷史學範疇，故捨棄Ernest Gellner等結構功能論，強調實證的研究途徑，採取偏向歷史制度論、強調時空脈絡的研究途徑。Anderson認為「民族」是某些人民，透過「主觀的認知」所形成的「想像共同體」，且共同體擁有「主權」和「邊界」。¹²Balibar認為一個社群團體形成的決定性因素，不在該群體所具有的血統、語言、宗教等文化內涵，而在於區隔內外的「邊界」(boundary)。¹³Bauman則指出「民族」塑造過程的首要任務，在於畫定「我族」與「異族」之間的「邊界」。¹⁴就民族塑造過程而言，Anderson肯定「群體對自我的想像」——「主觀」因素的重要性，Balibar則直指語言、血統等「客觀」因素較為次要，而三位學者均肯定「劃定邊界」是塑造「民族」的重要關鍵。「民族主義」——Anthony Smith則指出是一種意識型態的運動，用以獲取與維繫一群人（a

¹²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2010），41-43。

¹³ Etienne Balibar, "Racism and Nationalism," in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London: Verso, 1991), 49

¹⁴ Zygmunt Bauman, "Soil, blood, and identity," *Sociological Review*, 40:4 (1992): 683-684.

population) 的主權、團結與認同。這群人之中有人認為擁有組織「民族」的實際/潛在之需求。¹⁵綜合上述說法，並配合題旨，本文將「民族」定義為：一群人中具有發言權者，透過主觀的想像畫定一道區隔「他者」邊界，所創造出的「我群」。「民族主義」則是塑造「我群」，並凝聚其認同的意識型態運動。「(中國)民族主義史觀」一則意指郭廷以等學術菁英，以「內括性」(inclusive) 和「排除性」(exclusive) 為原則，透過設定「中華民族」的邊界，並製造邊界內外人群之形象差異的「史學書寫方式」。「官方(中國)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 則指涉戒嚴時期中華民國政府憑威權政體，以「由上至下」所推動的官方意識形態，以「反共抗俄」為核心，融入漢族、中原核心和黃帝共祖說，並矢志恢復民初的土地——包含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轄有的中國地區、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外蒙地區，企圖將臺灣群眾凝聚成一個「中華民族」，將臺灣島作為民族復興基地。¹⁶

章節安排上，第一節闡述研究背景、動機、文獻回顧、研究對象、史料和章節安排。第二節，討論「中國近代史」此學門的出現，以及「近代通史」、「近代外交史」與「近代邊疆史」此三個次領域勃興的時代背景，特別著重於與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關聯性。第三、四兩節，聚焦於研究對象以何種詞彙、敘事手法來描寫特定「史實」，以證明此是否可被稱作「民族主義史觀」？並具體歸納研究對象在

¹⁵ Anthony Smith,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2001), 9

¹⁶ Anderson 指出「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 是十九世紀以降，歐洲各大帝國的王室為了反制「由下而上」的「群眾民族主義」，所推動「由上至下」推動官方意識形態，藉以收編「群眾民族主義」所凝聚「國族共同體」。故筆者借用 Anderson 的詞彙，描述國府當局吸收起自民間的「中國民族主義」，並將內容統一、甚至制度化後的「官方意識型態」。相關討論可見: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15-16、157-158。

外交史、通史和邊疆史等各次領域的論述特徵。第五節，藉由二、三、四節之研究成果，回答前言所提出的問題。

二、「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萌發

甲午戰爭失敗後，刺激晚清士人將國家興亡寄託在國家制度的改革，1904年《奏定學堂章程》的頒布，可謂現代中國高教分科之起點。《奏定學堂章程》採用西方教育的「分科分門」制，文學科下轄萬國史學、中國史學，可說是「學院化」史學建制的起點。¹⁷1922年中華民國教育部通過《學校系統改革案》（壬戌學制），確立「選科制」，使得此後各大學課程逐漸豐富。¹⁸以「中國近/現代史/中國近世史」為名的學門，在北京大學、光華大學、廈門大學等高校出現。¹⁹1940、1944年教育部制定的歷史系課程標準，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世史分別被列為必修課目。²⁰由上述可知，「中國近代史」領域在教育體系內被建制化的概要過程，但該學術領域為何被當時高教機關高度重視，是否與近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具有聯繫？清末至民國時期有哪些關於此領域的代表性研究？國府撤退來台後，中研

¹⁷ 當時可分經學、政法、文學、醫科、農科、工科和商科，每科之下設二至十一門不等。學部，〈奏籌辦京師分科大學併現辦大概情形摺〉收入：潘懋元、劉海峰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41。「學院化」史學與其建置，均得自劉龍心教授的提示。劉龍心，〈新史學與「學院化」史學與其建置〉，《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2002）。

¹⁸ 姜義華、武克全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歷史學卷》（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53。

¹⁹ 國立北京大學，《國立北京大學課程指導書》（北京：北京大學，1925-1926），1-2。國立廈門大學編，《廈門大學佈告 1：1》（福建：廈門大學，1921-1922），85-89。光大的資料轉引自：張耕華，《人類的祥瑞——呂思勉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98），112。

²⁰ 1940、1941年的資料均轉引自：劉龍心，〈新史學與「學院化」史學與其建置〉，186-188；教育部，《大學科目表》（重慶：正中書店，1940），50-51。

院近史所又如何成為此領域在臺灣發展的重鎮？該機構的早期研究重心與民族主義又有何聯繫？本節皆嘗試回答上述問題。

（一）中國民族主義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中國近代史」此研究領域（field）/訓練（discipline）的出現，與1.清季史學革命下「擺脫帝王家譜」書寫、2.史料學派的科學治史原則，以及3.1920年代歐美學界受到一次大戰影響，開始反思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關係的研究風潮等三項因素有關。²¹第三點原因，與本文研究最具關係，故以下深論之。鴉片戰爭以降，清帝國、中華民國對歐美日諸國在中勢力，均無法作出有效反制，先後造成中國在國家財政、治外法權、商業利益、領土疆域的損失，從東亞強權淪落為貧弱之國。一些受到歐美思潮啟蒙的知識份子，也開始積極檢討在帝國主義壟罩下的「近代中國之命運」，特別著墨於中外關係、邊疆政治與民族等議題，發展出「近代外交史」與「近代邊疆史」等次領域，詮釋觀點或使用的詞彙則多帶有民族主義的色彩。²²配合本文主題，以下討論「中國近代史」中的近代通史、近代外交史、近代邊疆史等次領域之興起，並聚焦於民族主義在幾個次領域的草創期扮演的中要角色。

²¹ 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41-81。

²² 學界近年出版的討論二十世紀前半葉史學發展的書籍，肯定民族主義思潮和「中國近代史研究」、「邊疆史地研究」的關聯性。可參見：張海鵬、龔雲，《中國近代史研究》（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32-34、108-113；姜義華、武克全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歷史學卷》，228；孫喆、王江，《邊疆、民族、國家：《禹貢》半月刊與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邊疆研究》（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1. 「中國近代通史²³、外交史」研究的興起

若從倡導「史學應及時研究剛剛發生的重大事情」的梁啟超談起，其在晚清所撰寫的《戊戌政變記》、《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民初護國軍之役結束後，立即編纂相關史料的《盾鼻集》，都可算是最早的中國近代史研究。²⁴梁氏抨擊傳統史學「貴古輕今」，並以生物進化論史觀為軸心，注重現實政治和近代史的關聯性，以及對晚清民初人物的觀點，對於以後「中國近代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²⁵1920年代起，書籍市場上出現不少以近世、近代或近百年為名的「近代通史」，如李泰芬《中國最近世史》以鴉片戰爭為起點，以民族主義貫穿全書，多次再版且流傳甚廣，也是當時北京大學預科教材。²⁶因應於近代以來中外關係的劇變，「近代外交史」乃是中國近代史發軔期的研究重心之一。第一本具有現代學術意義的中國近代外交史，應自劉彥的《中國近時外交史》談起。該書以「我國失敗之外交為主旨」²⁷，敘述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到1911年列強鐵路大借款期之間的史實。該書緒論將中外關係的演變分為幾個時代，鴉片戰爭以後的近百年屬於「外力壓迫時代」。²⁸綜觀之，劉著以民族主義立論，

²³ 一位匿名評審指出「近代通史」或「中國近代通史」兩個詞彙均非「學界所慣用之行話」，建議筆者勿自創/使用該詞彙。筆者雖同意評審之看法，但在本文仍必須使用該詞彙。原因如下：「通史」此詞彙指涉一種史學題材/研究領域—探討某個斷線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總體性的發展，如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以區別於「專史」—專研某個斷線的政治或經濟等個體性發展，如黃嘉膜，《甲午戰前之臺灣煤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61）。

²⁴ 姜義華、武克全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歷史學卷》，228-229。梁啟超所著三書，均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上海：中華書局，1936），卷1，《戊戌政變記》、卷2，《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卷9，《盾鼻集》。

²⁵ 張海鵬、龔雲，《中國近代史研究》，51-59。

²⁶ 王學典主編，《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1900-1949）》，卷1，67-68。

²⁷ 劉彥，〈例言〉，《中國近時外交史》（上海：華昌書局，1914），1。

²⁸ 劉彥，〈緒論〉，《中國近時外交史》，1-3。

揭露近代西方諸國對中國造成的傷害和「恥辱」，以理解過往國族之失敗，思索將來如何圖強。劉氏任職中華民國政府眾議員期間撰寫的《歐戰期間中日交涉史》，旨在揭開袁世凱向日借款一事，以民族主義立場，指謫袁氏「通敵賣國」，在當時輿論界引起不少議論。²⁹根據統計，1949年以前此類以列強侵華、國難/國恥、外患為敘事軸心和主旨的「近代中國外交史」，專書共約130部、專文約300多篇，「中日外交史」則為此領域之熱門議題。

1931年起，政學兩界兩樁關鍵因素/事件，使得「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進入另一階段：其一，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行動加劇，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的「中國近代史」開始成為史學界關注焦點之一；³⁰其二，羅家倫發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意義與方法〉，以現代西方史學的觀念，對「中國近代史研究」做出系統化、科學化的規範，並揭示今後發展的方向，是該領域的里程碑。³¹1930-1940年代在兩因素交織影響下，不少菁英學者投入中國近代史學的隊伍。蔣廷黻、李鼎聲分別出版《中國近代史》，前者秉持「近代化史觀」，後者則發揚「馬克思唯物史觀」，但兩者實際上均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史觀色彩。³²上述著者皆為晚清民初的政治/學術菁英，他們意識到「近代史」此新興領域之於現實政治的重要性，故以著述和授課方式來參與，對當時的知識分子影響十分深刻。

²⁹ 劉彥，《歐戰期間中日交涉史》（上海：太平洋印刷，1921）。

³⁰ 張海鵬、龔雲，《中國近代史研究》，108。

³¹ 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61-62。

³² 謝保成，〈史書撰著與歷史文獻整理〉，《民國史學述論稿（1912-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03；張海鵬、龔雲，《中國近代史研究》，109。

2. 「中國近代邊疆史地」研究的興起

近代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學術傳統，學術上的脈絡始於清代嘉道以降的「歷史地理學」，政治上的脈絡則起自鴉片戰爭以降的外患侵逼之局。而近代以降共有兩次邊疆史地研究的高潮，第一次在於鴉片戰爭前後，形成了以探討中國邊疆史地為主體，進而推動世界史地研究的學術社群，而由於當時英俄等列強對中國西北疆的侵略最盛，故「西北邊疆史地」研究為當時最蓬勃發展的領域。³³魏源《聖武記》、何秋濤《朔方備乘》為此時期的代表性著作。《聖》講述康熙至道光年間，清帝國征服巴蜀、新疆、西藏、臺灣等地的事蹟，以及俄國對中國邊疆地區的領土野心；《朔》考察西北邊疆地區的文化，以及俄國對西北邊疆的侵略。³⁴兩書都具濃厚的民族主義史觀，本文的主角郭廷以自承兩書對其頗具影響力。³⁵

新興的日本帝國在1920年代因「大東亞共榮圈」的目標，政治界有川島浪速提倡的「滿蒙獨立運動」、³⁶學術界的「朝滿學」、「滿蒙學」研究也順勢興起，³⁷政學兩界逐漸形成「滿蒙非中國論」的論點。近代中國的第二波邊疆史地研究在此時期興起，以張其昀等《西北問題》、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為代表。³⁸另一方面，傅斯年《東

³³ 章永俊，《鴉片戰爭前後中國邊疆史地學思潮研究》（合肥：黃山書社，2009），78-79、249。

³⁴ 魏源，《聖武記》（長沙：岳麓書社，2004）；何秋濤，《朔方備乘》（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³⁵ 張朋園等訪問，《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129。

³⁶ 王柯，〈從「勤王大清」到「滿蒙獨立」——川島浪速的「滿蒙獨立運動」〉，《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5），137-192。

³⁷ 青木富太郎，《東洋學の成立とその發展》（東京：瑩雪書院株式會社，2013），176-266。

³⁸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以《史地學報》、《禹貢半月刊》為中心的探討》（臺北：東大圖書，1995），286、348-349。

北史綱》、蔣廷黻的《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金毓黻《東北通史》則是中國學界試圖反駁該論點的著作。³⁹此外，以下兩個學術社群之成立，與民族主義思潮亦頗具關連－1921年創刊《史地學報》的「南高史地學派」、1934年創刊《禹貢半月刊》的「禹貢學派」。兩個學術社群不約而同關注於歷史地理學門中的「當代史地」和「邊疆史地」兩個次領域，在學術研究中闡發對國家、民族和時代的關懷，形成帶有民族主義史觀的史學論著。⁴⁰

（二）「冷戰－內戰」架構下中研院近史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1950s-1975）

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後，一度失去美國的支持，國際地位岌岌可危。直到1954年韓戰爆發後，美國圍堵亞洲的共產勢力，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方有能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抗衡。隔著臺灣海峽對峙的「兩個中國政府」，乃是國共內戰的延續，加上美國和蘇聯兩大勢力在亞洲的盟友爭奪，形成所謂的「冷戰－內戰」雙元架構。而本段聚焦於討論「冷戰－內戰」雙元架構和當時臺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之間的互動關係。

返回探索學者的足跡，以「中國近代史」為專長的學者，在1949年後僅有少數隨國府遷臺。這些學者中，長期在學術界服務，且對臺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之發展具有深刻影響力者，首推創辦近史所的郭廷以。郭先生本人和其帶領的一批弟子，在國際政治局勢動盪，且研究資源缺乏的1950、60年代，替臺灣的「中國近代史」

³⁹ 傅斯年，《東北史綱·初稿》（北平：傅斯年出版，1932）。

⁴⁰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以《史地學報》、《禹貢半月刊》為中心的探討》，291-293。

研究起了扎根的作用。換言之，從他們的學術活動和著作中也可勾勒「中國近代史」在當時的發展趨勢與特徵。在本段的第一小節將介紹近史所草創時期的過程和著重的學術領域，以及本文研究對象－郭廷以、王聿均、黃嘉謨、李毓澍等四人的生平與學術背景。其次，從近史所早期發展方向、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獎勵、近史所與美國的學術合作、戰後對中日和中蘇外交史的重新定位等四點，剖析「冷戰－內戰」雙元架構對於近史所草創時期研究領域和主題的影響。

1. 近史所草創期的人員介紹與研究重心

1955年2月，中研院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以郭廷以為籌備處主任，初期工作重點在於檔案資料之蒐集、中西圖書之添購、研究人員之羅致與訓練，以及研究計畫之釐訂與進行等。⁴¹1965年4月正式設所，以郭廷以為首任所長。草創期的研究陣容，可依到職時間、輩份年齡分成兩代。第一代研究人員的陣容：所長：郭廷以；研究員：張貴永、陶振譽、楊紹震；副研究員以下：王聿均、黃嘉謨、李毓澍。張、陶、楊三人為近史所與其它機構合聘的研究者，且三者的研究領域並非以中國近代史為主；郭、李、王、黃為專任研究者，且郭為其它三人的老師，故早期該機構的業務執行實際為此四人承擔。⁴²郭、李、王、黃四人擅長的研究領域是中國外交史和

⁴¹ 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主編，《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任重道遠全院篇》（臺北：中央研究院，2008），56-60。

⁴² 陳儀深主訪，〈王聿均先生訪問記錄〉，收入於陳儀深、黃克武等訪問，《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錄》，39-40。四位學者的生卒年，郭廷以（1904-1975）、王聿均（1918-2007）、李毓澍（1919-?）、黃嘉謨（1919-2004）。郭氏資料參考自：張朋園等訪問，《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7）。王氏參考自「臺灣文學網」網之介紹：

中國邊疆史，這兩個次領域也最可呈現民族主義的史觀，也是該機構內部當時最多人涉及的研究領域。⁴³第二代研究人員人數較多，大多數為郭氏在臺灣師範大學任教時的學生，研究領域亦廣佈於中外關係、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多已擺脫民族主義史觀，以近代化理論為治學依歸。⁴⁴綜合上述，本文挑選郭廷以、王聿均、黃嘉謨、李毓澍為研究對象，欲理解草創期幾個重要的學術次領域和民族主義思想的關聯性。

以下介紹郭廷以、王聿均、黃嘉謨、李毓澍的生平與學術背景。郭廷以，出生於西元1904年，在東南大學歷史系完成基本的學術訓練。根據郭先生的口述，其早年曾受五四學潮的影響，諸如請願、罷課抗議、反日貨輸入等行動均親身參與，懷抱「反日救國」的熱誠。⁴⁵對日軍侵略中國之行動，如濟南慘案，讓他「難過得要掉淚」，並痛斥日人「的確可惡，濟南許多無辜軍民遭其荼毒」；戰爭時期在四川等地躲避日軍空襲，戰後看到日軍對長江流域「搜刮燒殺」。⁴⁶從以上訪談，不難發現郭先生對日方的抵制和批判，亦夾雜濃厚的民族主義的情緒。郭氏在中國時期以編寫史料為主，遷臺後則以近代通史與近代化理論、中外關係（日、俄、越、韓四國）、中國西北、

http://tln.nmtl.gov.tw/ch/m2/nmtl_w1_m2_c_2.aspx?nm=%E7%8E%8B%E8%81%BF%E5%9D%87

後兩者的資訊，參考自國家圖書館全國書目查詢系統：<http://nbinet3.ncl.edu.tw/> 點閱日期：2015/1/14 16:44。

⁴³ 1955 籌備處成立到 1965 年正式創所，可視為近史所的草創期。根據一份 1965 年的中研院內部資料顯示，當時近史所的專任或合聘人員中，學術專長為邊疆史、中外關係史者居多。

詳見：〈中美及中加文教雜卷（五）〉，《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50207-0007。

⁴⁴ 關於第二代研究人員的描述，可參考：潘光哲主訪，〈王爾敏先生訪問紀錄〉，178-188。

⁴⁵ 關於郭氏的生平簡歷，中學參與反日運動的經歷可參考：張朋園等訪問，〈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82-87、261。

⁴⁶ 張朋園等訪問，〈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180-182、203-215。括號內文字為郭廷以本人說法之原文。

東北地區的邊疆史、臺灣史著作為專攻領域。⁴⁷李毓澍、黃嘉謨、王聿均皆畢業於由東南大學改制的中央大學，王、李二人是歷史系的同屆同學(1928-1932)、黃氏則為法學系，但三人都曾受教於郭廷以。王氏回憶就學期間，中大校長羅家倫經常在朝會上演講與愛國精神有關的主題，勉勵該校的學生需肩負起國家、民族特殊的使命。王氏也見識到日軍不斷以飛機轟炸造成大量死傷，進而對日軍感到憤怒。⁴⁸而在日本宣布投降的時刻，則是與重慶市全體軍民陷入狂歡，並認為這是「民族情感的自然奔放和流露」。⁴⁹從王氏的口訪中，也窺得他在戰火中完成學業的磨難，並進而產生的民族情感。李、黃雖未留下口訪紀錄，但對國族命運的體悟應是與師長郭廷以和同儕王聿均接近。在學術領域方面，王擅長中蘇外交史；李擅長中日關係與外蒙古問題。⁵⁰黃學術生涯的開端，以研究臺灣為主題，乃是戰後最早開始研究臺灣史的外省籍人士之一，生涯晚期轉入廣西省的研究。⁵¹

2. 「冷戰－內戰」架構對近史所草創期研究重心的影響

為何近史所草創期的研究重心是中國外交史和邊疆史呢？單純從學術的理由來看，該所成立之初，最主要典藏的史料，就是以清末總理衙門、外務部和民初外交部為主的檔案。⁵²若從現實政治的考

⁴⁷ 郭廷以先生較完整的著作目錄和研究領域，可參考呂實強編、郭廷以撰，《近代中國的變局》（臺北：聯經，1987），445-456。

⁴⁸ 陳儀深主訪，〈王聿均先生訪問記錄〉，7-9。

⁴⁹ 陳儀深主訪，〈王聿均先生訪問記錄〉，27。

⁵⁰ 潘光哲主訪，〈王爾敏先生訪問記錄〉，178-188。

⁵¹ 關於黃嘉謨生平與學術生涯的詳細介紹，可參考：朱泓源，〈黃嘉謨〉，《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0（1990.09）：89-97。

⁵² 〈與朱家驊二〉，收入陸千寶編，《郭廷以先生書信選》（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量來看，該機構之所以發展中國外交史和邊疆史，可能是受到美蘇冷戰、國共內戰的所構成的「冷戰－內戰」雙元架構之影響。以下本文將從四點來分析其具體原因：

(1) 近史所早期發展方向

根據郭廷以草擬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計畫大綱草案」，創所之初將「中外國際關係」列為主要研究範疇。⁵³事實上，教育部同意增設近史所的重要原因，在於當時學界缺乏對「帝俄侵略中國史」和「國際現勢及組織」專責機構。⁵⁴教育當局的態度，彰顯在冷戰時期對於共產陣營的領導者－蘇聯，以及國際關係的近代發展之重視。

(2) 中華民國政府的政策獎勵

1958年所修訂的《出版法》⁵⁵第二十三條第三款「宣揚國策有重大貢獻者」和第五款「印行重要學術專門著作或邊疆、海外研究和職業學校教科書者。」從法條得知，從事邊疆研究、或宣揚國策－三民主義有重大貢獻者，均得以獎助出版，這也提供草創初期經費短缺的近史所投入邊疆史料的蒐集，和近代邊疆研究一個良好的契機。⁵⁶郭廷以得以致力於培訓戰後臺灣第一批專攻於近代邊疆史的人才，李毓澍、黃嘉謨皆可算是其中代表。

(3) 近史所與美國學術機構的合作

研究所，1995），6-7。

⁵³ 「中國近代史研究計畫大綱草案」轉引自：王聿均，〈朱家驊與近代史研究所〉，收入於陳三井主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202-203。

⁵⁴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臺北：中央研究院，1985），8。

⁵⁵ 1958年6月20日的版本《出版法》全文檢索，擷取自：立法院法律系統：[http://lis.ly.gov.tw/lcgci/lglaw?@131:1804289383:f:NO%3DE02402*%20OR%20NO%3DB02402\\$\\$11\\$\\$SPD%2BNO](http://lis.ly.gov.tw/lcgci/lglaw?@131:1804289383:f:NO%3DE02402*%20OR%20NO%3DB02402$$11$$SPD%2BNO)，擷取時間：2015/1/5 13:57

⁵⁶ 近史所初期經費短缺的情況可參看：張朋園等訪問，《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129。

1950至60年代國際冷戰的局勢下，臺灣和美國是重要的外交、軍事夥伴。同樣地，兩國的學術交流亦十分頻繁，臺灣新成立數個學術機構普遍缺乏金援，美國的學術機構則對於清末至中共建政以來的檔案資料頗為留心，⁵⁷近史所和美國學術機構的合作即在此氣氛下開展。1950至60年代初期，近史所相繼與美國的學術機構，如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遠東學院、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學院與本所合作，從事中俄、中日和中美關係的史料編纂。⁵⁸1960年郭廷以參與中美學術合作會議，在會中結識當時美方中國研究學界的重要人物費正清（John k. Fairbank）、韋慕庭（C. Martin Wilbur），乃促成近史所獲得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兩個五年計畫（1962-1972）的契機。⁵⁹近史所提出的申請計畫中，強調以該所典藏的近代中國外交檔案，來全力研究中美、中俄的外交關係，這實際上與冷戰時期「聯美抗俄」的政治需求具有密切關係。⁶⁰該計畫給予近史所在學術研究、人員訓練和圖書購置上的贊助相當龐大，但某程度上也框定這十年間近史所的學術發展方向。

(4) 戰後對中日、中蘇外交史的重新定位

戰後早期中國外交史，特別具有教育與借鑒性的意涵，而以中蘇、中日關係最為當時學界所重視。⁶¹但學者對中國與蘇聯、日本外交關係的解讀，卻因為「冷戰－內戰」框架，而有不同於二〇至四〇年代的評價。以下說明之：1949年後撤退來臺的中華民國政府，

⁵⁷ John k.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82), 383-384.

⁵⁸ 〈中美及中加文教雜卷（五）〉，《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50207-0007。

⁵⁹ 張朋園，《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7。

⁶⁰ 張朋園，《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9。

⁶¹ 林正珍、劉瑞寬編，《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 1945-2000：中國近現代史卷》（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4），59。

對於國共內戰的失利，亟需獲得解答。在學術領域上的解答，除倚靠「匪情研究」⁶²外，也須透過史學的視角，討論十九世紀以來日本帝國、沙俄、蘇俄與中國的關係。曾受日本殖民統治、現今為光復基地的臺灣，與俄國接壤的東北、西北疆，和外蒙古地區之近代史，更是必須理解的課題。日本、蘇俄作為對近代中國最具「領土野心」的兩國，中國軍民對日俄兩國侵略的歷史記憶，乃是國府當局塑造國族敵人，以求內部團結、進行反共戰爭的最大利器。然而，戰後「日本—自民黨政府」也是「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在美蘇冷戰體系下，東亞反共陣營堅實的盟友。因此，筆者認為處在「冷戰—內戰」體系下的國民黨政府，面對日本，處於塑造「過去的記憶」與鞏固「現今的政局」的兩難。另一方面，1949年前的國民黨政府面對俄國，則因聯俄容共、排俄反共等政策反覆，而持較為保留的態度。1949年後國府則在歷史和現實不衝突的狀況下，積極將俄國塑造為國族他者。因此，1949年前後，國民黨政府對於中日關係、中俄（蘇）關係的詮釋，必須有重新定位的狀況。

經過上述後四條線索的追尋，得知中國近代史研究和臺灣島內外現實政治之變化密切相關。美蘇冷戰對東亞地區形成特殊的局勢，導致中、韓、越三國形成「分裂的民族國家」和「六個分治的政權」。而每一對峙組合的政權，如中華民國V.S中華人民共和國、南韓V.S北朝鮮、南越V.S北越，不約而同宣稱自己才是所謂的「正統/合法政權」。此一特殊情勢，使得「六個分治的政權」的當局，均面臨「冷戰—內戰」的雙元架構。在此雙元架構影響下，在國際上，

⁶² 「匪情研究」乃是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在國共內戰失利後，再加以被嵌入美蘇冷戰體系下，所衍生的一門學術專業。而目前學界對此學門的討論，可參考：陳至潔，2013年8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爭辯中國：中國研究在戰後臺灣的觀念變遷」，國科會計畫（NSC 102-2420-H-004 -055 -MY2）。

須倚賴同一集團政權的支持，訴之於共產/資本的意識形態之爭；在統治區域內，強調擊退內憂，以及內憂背後的美/蘇兩大強權之一，以達到復國的任務，故訴之於民族主義之意識形態。以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思考上述架構：國共內戰下的「擊敗中共，反攻大陸」，與西方陣營「對抗中共，防止國際上的共產勢力擴張」，兩者的政治需求相近。政治需求應用於學術場域上，所以臺灣當局透過鼓勵特定學術領域的研究，一方面解答國共內戰的失利原因，並理解近代以來的國際現勢；另一方面，塑造「國族他者」—蘇俄、中共、日本的負面形象，凝聚並強化島內學術界和人民反共抗俄、批日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由此可知，「冷戰—內戰」的雙元架構對於近史所草創期學術領域的選擇之影響，是故該所的中外關係史、邊疆史地研究蓬勃發展，下章即試圖解析其中所蘊含的民族主義史觀。

三、郭廷以、王聿均、李毓澍的「中國近代通史/外交史」研究

本節之目的，將致力於挖掘過往強調近史所早期學術成果「客觀實證」、善用「近代化理論」的主流詮釋下，可能被遺忘與忽略的「民族主義史觀」。本節將以郭廷以、王聿均、李毓澍三人在中國近代「通史」和「外交史」的學術論著作為分析對象，討論他們對特定史實的解釋為何？以何種詞彙、敘事架構來描述？具體分析的議題，擴及他們對中國固有領土疆域、近代歷史，以及中國與蘇聯、日本，和其他國家外交關係的研究，討論他們如何認識與想像近代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困境？批判哪些歷史事件與人物？對中國「固有疆域」看法為何？對近代中國重要政治勢力，如清帝國、太

平天國、袁世凱政權與北洋政府、孫文勢力、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中國共產黨，各自有何評價？

（一）中國外交史研究

Edward Said曾指出一個社群集體認同的建構過程/機制中，往往包含對另一特定社群的「他者建構」。⁶³意即定義「我群」過程之中，往往亦需透過定義「他者」來使「我群」的形象/特徵更為明顯。此道理亦可運用於分析郭廷以等人的中國外交史著作，本文藉由觀察其如何定義和詮釋其他國家，使之成為國族他者，以確認中國的自我形象？

1. 郭廷以的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

郭廷以的中外關係史的著作中，有四篇較可完整呈現民族主義史觀，分別是《俄帝侵略中國簡史》⁶⁴，以及收入於呂實強彙編的《近代中國的變局》的另三篇文章。⁶⁵郭氏對中外關係、人物評價的思考，筆者將摘錄原文入表格，並以文字討論之：

表1

	中外關係的思考	人物描繪、介紹或評價
〈俄國早期侵韓陰謀的〉	1.韓俄關係	1.俄方

⁶³ 見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329-352.

⁶⁴ 郭廷以，〈《俄帝侵略中國簡史》〉（臺北：臺灣書局，1955）。

⁶⁵ 呂實強編、郭廷以撰，〈俄國早期侵韓陰謀的被阻〉、〈中日交涉的歷史教訓〉、〈中越一體的歷史關係〉，《近代中國的變局》，185-216、243-278。

<p>被阻〉</p>	<p>(1) 俄人得寸進尺，又染指朝鮮（199）、俄國的滲透陰謀（205）、俄國的陰謀，立即引起國際間的不安……（207）。</p> <p>(2) 朝鮮亦與俄比鄰，開始受其威脅。（199）</p>	<p>Alexis Speyer（士貝耶）：初則甘言誘惑（205）、惱羞成怒，連續以危辭恐嚇（206）。</p> <p>2.韓方</p> <p>(1) 閔妃：對於中國心懷怨懟，含王傭孺，惟其言是從（213）、事機敗露，閔妃稱病（215）</p> <p>(2) 金允植：（俄方）極盡挑撥間的能事，金允植仍然堅拒。...認為國際間的往還，應該以信義惟本...據理加以駁斥。（206）</p> <p>3.中方</p> <p>袁世凱：毅然進兵，敕平（甲申）事變。...又特撰「摘奸論」，揭發俄國的狠毒策略...。（211）</p>
<p>〈中越一體的歷史關係〉</p>	<p>中越關係</p> <p>1.中越早期關係：.....與中國關係接觸最早，關係最深，彼此歷史文化實同一體的，首推越南。（243）</p> <p>2.中越文化程度：如與中原</p>	<p>越方</p> <p>(1) 南趙武王：趙陀源出河北（245）</p> <p>(2) 自涇陽王建國，經安陽而至趙陀，統治越南的王室，均系出中原。（247）</p>

	<p>相較，交趾、九真、日南的文化程度，原初頗為落後...。(249)</p> <p>3.中法戰爭：此次中國對於越事總算盡了最大的努力，且不惜以國運相賭。(275)</p>	<p>(3) 士辨：最大的功績，為提高越南的文化，使其真正與內地一體。(254)</p> <p>(4) 其它統治者：莫登庸、李公蘊(264)皆來自中國。</p>
<p>〈中日交涉的歷史教訓〉</p>	<p>1.中日關係</p> <p>(1) 近代中日關係：甲午戰前，尚係伺機而動，乘危欺凌；甲午戰後，猙獰面已露；民初以來，變本加厲；投降前的十五年則等於瘋狂。(186)</p> <p>(2) 甲午戰爭近因：一為東學黨之亂；二為中日撤兵問題；三為共改韓政問題。(191)</p> <p>(3) 日俄戰爭：...而「血濃於水」的同種同文心理與大義。(194)</p> <p>2.中韓關係：江華島事件：日本即決定斷然處置，否認中韓一體的歷史關係。(189)</p>	<p>日方</p> <p>(1) 專使大久保利通：對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胸狹狠辣... (188)</p> <p>(2) 江華島日使森有禮：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態度？(190)</p>

<p>《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p>	<p>1.清帝國與沙俄關係</p> <p>(1) 近代以前中俄國界：西伯利亞和中國的早期關係，可置不論...單就明代來看，成組的東北經略，無疑的已將黑龍江兩岸及烏蘇里江流域收入大明帝國的版圖，包含苦夷（庫島）。</p> <p>(1)</p> <p>(2) 清初尼布楚條約：這個東北可稱之為「大東北」。遺憾的是我們不曾將色勒格、尼布楚之地收回，貝加爾湖以東，額爾古納河以西，終為俄人所吞去。(8)</p> <p>(3) 清俄北京條約：(俄)輕易地攘奪較現在東九省尚大的土地，包括庫島和海參崴...完整的大東北變成了殘餘的小東北。(17)</p> <p>(4) 外蒙與呼倫貝爾問題：外蒙與呼倫貝爾實際上無異帝俄的附庸。(41)</p> <p>(5) 清俄關係總評：帝俄對華侵略，...威嚇與欺惑兼</p>	<p>1.俄方</p> <p>(1) 優林：意氣甚囂，多所要脅。(54)</p> <p>(2) 越飛：第一流外交家兼陰謀家越飛(Adolph A. Joffe)東來。(55)</p> <p>2.中方</p> <p>(1) 張作霖：檢獲蘇俄擾亂中國的大批陰謀文件...無一不足證明蘇俄利用外交機關，助長中國內亂的狠毒非法行為。(65)</p> <p>(2) 孫文：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後，能接受三民主義的洗禮...將其自共產邪說中救出...」。(69)</p> <p>(3) 蔣介石：彼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薩之帝國主義。(70)</p>
---------------------	--	---

	<p>施，受禍最烈的是東北、西北與蒙古，一度將其魔掌伸入西藏，最後勾結日本。</p> <p>(42)</p> <p>2.中華民國與蘇俄關係</p> <p>(1) 民初蘇俄和中共、軍閥：更狠毒的為以中國攻中國的瓦解運動 (62)</p> <p>(2) 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指使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陰謀 (67)</p> <p>(3) 「共匪」（意指中華人民共和政府）：所有中國大陸的軍政、政治...學術無一不在蘇俄控制之下，無一不俄化，無一不奴化，暫時成為蘇俄的附庸。</p>	
--	--	--

觀察表格對郭氏原著的摘錄可知，郭氏如何界定中國，與日本、韓國、越南和俄羅斯等四國的關係：

(1) 近代中外關係：

以「侵略者/被侵略者」此敘事架構呈現，將日、俄假定為侵略者，對日方貶抑遠多於褒獎，對俄方則幾乎全數為負面描述；中、韓、越為被侵略者。韓、越在近代分別遭到日、法侵略，中國為捍

衛韓越兩國，故先後爆發中法、中日戰爭。⁶⁶

(2) 在人物形象的描繪和評價：

日、俄兩方之人，若非陰謀，則為囂張；越、韓兩方之人，是否「與中國親善」為主要評斷標準；中方則以是否積極「抵禦外國」為主要評斷標準。日、俄兩國恆以負面的人物形象呈現，且對俄方的評價更低。

(3) 在血統與歷史關係：

韓、越兩國的歷史與中國一體，故近代兩國遭逢它國侵略時，中國挺身而出保護；日本在近代雖然侵略中國，但中日乃「血濃於水」的同文同種關係，故日俄戰爭時，中國民間才會挺身相助日方。反之俄方則自始被郭氏稱為「羅刹」的異族。⁶⁷

(4) 文化議題：

日、越兩國在古代的文化程度均較中國為低，故古代中國對越的介入，有助於其文化之提升；對日的介入，亦有益/恩於其發展。

(5) 對中國「固有疆域」的認識：

以清初尼布楚條約的版圖為主要依據，而可上溯至各代曾統治該區的歷史。在中外關係視角上，郭氏對中國固有疆域的認識，與其從邊疆史視角出發，得出的結論基本上是一致，此點更進一步的討論，將留在下文說明。

綜合來說，前兩點是郭著對主要的「國族他者」——日、俄，

⁶⁶ 關於郭廷對中日戰爭，中法戰爭爆發之因，分別歸於中方牽涉朝鮮、越南問題，可參者：郭廷以，〈中日交涉的歷史教訓〉、〈中越一體的歷史關係〉，《近代中國的變局》，185、273-275。

⁶⁷ 郭廷以，《俄帝侵略中國簡史》，1。

進行負面的描述，強調兩者在近代對中國的侵略，對人民的迫害，藉以激起民眾對外情緒，達成凝聚國家內部團結的目的。前四點的共同特徵，乃對在歷史洪流裏頭，曾與中華帝國/中原王朝建立「朝貢關係」、或曾為領土一部分的鄰國，懷有強烈「我族中心」的優越感。例如對韓、越兩國人物評價時，經常將其區分為親中/非親中派，並將親中派視為「正統」，此類界定準則反映我族中心的立場，也簡化韓、越國內政治之情況。而郭氏對過往國力不如中華帝國/中原王朝，在近代卻迎頭趕上、甚至超越的日本，做出「八十年前的兩千年，中國施之日本者甚厚，有造於日本者至大，八十年來日本報之於中國者極酷，為禍於中國獨深。」的評價，但又一再強調中國談判過程的退讓，以及期盼未來中日親善的價值。⁶⁸郭氏對中國與韓、越和日三國關係的評斷，反映其以中國為核心，組織地區的文化共同體的思索。自始未與中國建立朝貢關係的俄羅斯，則被排除於地區的文化共同體之外。郭氏對東亞地區國際秩序的思索，某程度反映其欲讓中國擺脫近代國力不振的國族恥辱，重返地域，甚至是世界的核心的理想。

2. 王聿均、李毓澍的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

而近史所內最早繼承郭廷以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為王聿均和李毓澍兩位研究者。王氏的代表作——《中蘇外交的序幕》，開宗明義即談到：

自一九一七年俄國政變，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其窺伺中國的野心，無時或戢。而所用的策略與手段，較帝俄時代，更為狡詐，更為毒

⁶⁸ 郭廷以對日本的觀點，主要取自：郭廷以，〈中日交涉的歷史教訓〉。而括號內的引文，則引自該文 185。

辣。往往假友好之名，行侵略之實，以反抗帝國主義為宣傳，以民族自決為口號，而暗中則趨使其第五縱隊，作積極的滲透，帝俄的蠶食鯨吞，強取豪奪，尚易能抵禦；蘇俄的挑撥誘煽，離間分化，則極難察覺應付。……蘇俄是我們最凶狠的敵國，對它的政治陰謀，外交詭計，……並對蘇俄的侵略，加以客觀的、深入的分析。俾國人了解蘇俄處心積慮以謀我，計畫早已草立，步驟早已擬定，絕非一朝一夕之事。⁶⁹

從引文窺得王氏對中蘇關係的認識，自始即建立在「侵略者/被侵略者」的敘事架構，和郭廷以著作的敘事架構很接近。而該書主旨—蘇聯來訪的代表團，王氏批判代表團人數過多，且來訪人員遍布外交、財政、新聞、軍事和文化等方面，實不符合國際外交禮儀和慣例。因此，王推論「其陰謀在中國做政治上之鼓吹，煽惑過激主義之用心，已甚明顯」。⁷⁰又談到蘇聯外交官越飛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加入中國國民黨時，王給予「越飛此行，主要勾結日本，至云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致力國民革命一層，純係謊言與騙術，彼等受命蘇俄，包藏禍心…」的評價。⁷¹此兩處顯示，王著對史料和事件的因果關係之判讀未必錯誤，但同樣充斥負面詞彙。此外，王書雖針對蘇聯外交官優林、越飛所領導的外交團進行專題研究，但對中俄雙方人物之描述仍充斥情緒性的詞彙，得到的結論也是「蘇俄全盤的錯誤」，並無超過郭廷以的論點。綜合來說，王著通篇大量使用「侵略者/被侵略者」的敘事架構，大量使用負面詞彙來評斷蘇聯。楊瑞松指出清季民族主義者鄒容、章太炎等人對「受害者」敘事的積極使

⁶⁹ 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從優林到越飛》（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1。

⁷⁰ 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從優林到越飛》，334-335。

⁷¹ 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從優林到越飛》，465-466。

用，具有激發國族悲憤情緒，凝聚國族內部完整，對抗外敵的功效。⁷²而將受害者敘事框架，首度運用於俄羅斯與中國東北問題者，應該是蔣廷黻成書於1930年代的〈最近三百年來東北外患史〉⁷³，而為郭廷以、王聿均所承襲。

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雖將研究對象轉換到日本，但觀其篇章主旨：

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原是想一舉宰制中國並獨霸東亞，但也是激長中華民族運動最有利的鞭苔……。……由於日本要求條款的酷烈，暴露將中國置之於附庸的野心，更由於交涉所施的手段和態度，嚴重傷害到中華民族的感情和尊嚴，烙在中國人心版的創痕，經二十年猶難平復。而日本猶不自省悟，變本加厲以一切手段對中國侵略與擴張，終導致中日的第二次戰爭……。⁷⁴

上述主旨同樣是以「侵略者/被侵略者」此敘事架構呈現，「中華民族」依舊是以受害者的身分出現在敘事之中。再來觀察該書的各章標題和內容，單獨指涉日本的内容，立論和用詞尚稱公允。但談到北京袁世凱政府與日本帝國的談判，用詞如下：「因袁氏帝制陰謀，早為外人窺破，日本抵隙蹈瑕，又無所不用其極……。」「⁷⁵「獨對此次交涉，明知陷阱，竟甘一蹈，明知鳩毒，竟甘一飲，若非為私慾所遮蔽，其昏庸當不至如是。」「⁷⁶「一面假顧全邦交之名，禁止排外種種舉動，一面又故意調動有關地方駐軍，以示外交最後的

⁷² 楊瑞松，〈打造共同體的新仇舊恨：鄒容國族論述中的「他者建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7（2012.05）：43-71。

⁷³ 蔣廷黻，〈最近三百年來東北外患史〉，《清華學報》8.1（1932.12），1-70。

⁷⁴ 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1-2

⁷⁵ 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235

⁷⁶ 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246

準備，純係欺騙國人的伎倆。」⁷⁷「唯日本所命，將來不吝為兒皇帝，日本大欲可償，袁王朝無意朝鮮李氏第二。」⁷⁸概要言之，李毓澍的論點，就是將袁世凱北京政府答應二十一條交涉，視為交換日本支持洪憲帝制的條件。⁷⁹李氏的推論雖未必有誤，但其詞彙之運用，卻充滿民族主義的話語，並試圖將袁政府與朝鮮李朝做連結，強調其政權媚日的方面。

（二）中國近代通史

本文的研究對象中，僅郭廷以曾撰寫通史類之學術著作，根據其著作目錄，共有成書於四零年代的《中國通史稿本》，郭廷以遷臺後五〇年代《中華民族發展簡史》（下文簡稱《簡史》），⁸⁰以及其於美國完成的遺作—七零年代《近代中國史綱》⁸¹等三本。後兩者落在本文的研究斷線內，但彼此觀點差距甚大，《簡史》全書架構與史觀，乃為典型民族主義史觀的著作；《近代中國史綱》已逐漸脫離民族主義的影響，以歐美學界二十世紀中葉後盛行的近代化理論的「西方刺激—中國反應」為主要架構與史觀。⁸²基於本節研究議題圍繞在民族主義史觀，故將以《簡史》的分析內容為主，特別專注於其整體架構和敘事手法。《中國通史稿本》、《近代中國史綱》的討論和史

⁷⁷ 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248

⁷⁸ 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251

⁷⁹ 參考：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的第三章部分。

⁸⁰ 郭廷以，《中華民族發展簡史》（臺北：國防部，1953）。嚴格說來，該書題材為通史。但以超過一半的篇幅（55-112），陳述1644年清帝國創建—1945年中日戰爭結束，繼承《中國通史稿本》的略遠詳盡的寫作方式，故本文也將其近代史的篇章視作「近代通史」的題材。

⁸¹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9）。

⁸² 關於歐美學界盛行近代化理論，與歷史學界的運用和影響，可參考：Wehler, Hans-ulrich 著；山口定等譯，《近代化理論と歴史学》（東京：未來社，1977）。

觀比較，將留待其它文章解決。

《簡史·緒論》強調中國歷史具有六個特徵，第六項——「近代的世變」，與本節討論近代史寫作關聯性密切，故將詳細分析其看法。何謂郭氏眼中的「近代世變」的開端，以及其特徵？近代的開端，乃起自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後。而近代具有兩項特徵：⁸³第一，近代中國面對的外族均兼具武力與文化實力；反之，近代以前的外族，僅有武力如匈奴突厥，或高度文化如印度。第二，面對近代的世變，清帝國當局、大臣康有為、太平天國洪秀全對中西文化之理解均不完整，故皆遭逢失敗的命運。郭著認為帶領中國突破近代困境者為孫文，共有五項「偉績」：結束專制，創立中華民國、推翻滿清統治，完成初步的民族革命、清除軍閥割據，統一全國、取消不平等條約，解除國家民族桎梏、抗戰勝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⁸⁴以下分成三點，深入解析《簡史》對「近代史實」的理解：第一，將匈奴、突厥視為外族；也將推翻清帝國，視為民族革命，反映出其漢族本位的思考；第二，將突破近代中國困境的功績全歸於孫文，批判清帝國當局、康有為、洪秀全不理解西方文化，更不提其他清末民初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去脈絡化地理解近代中國思想界的系譜；第三，五項「偉績」中，清除軍閥、取消「不平等條約」雖都是民初史實的陳述，但將其均歸功為孫文與國民黨的領導，這顯示郭著對民國初年政治系譜的思索，乃是將孫文、蔣介石先後領導的「廣州軍政府」，以及蔣氏的「北伐行動」視為正統。學者唐啟華指出從民初對外國際關係的談判，或就國境內行政事務的處置兩條線

⁸³ 兩項特徵為筆者自行歸納郭廷以對近代的看法，可參考：郭廷以，《中華民族發展簡史》，5-6。

⁸⁴ 郭廷以，《中華民族發展簡史》，6。

索來看，均以「北京政府」的決策與因應為主，南方的廣州軍政府僅是地方割據的勢力。唐氏也批判此種敘事模式，乃呈現國民黨政府去脈絡化理解民國歷史的「國民革命史觀」。⁸⁵事實上，兩岸學術界、社會大眾對國民革命史觀的熟悉與近用，乃是過往兩岸分別在國共長期專政下的負面影響。⁸⁶筆者以為「國民革命史觀」雖是局限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史觀，但可算是民族主義史學在該領域的呈現方式。「國民革命史觀」的內涵強調特定英雄人物（孫蔣）、民族歷經的光榮與悲慘命運（近代前的霸業與清末的衰亡），最終是民族的重生（抗日成功），Anthony Smith認為上述皆為民族主義神話建構所必備的元素之一。⁸⁷

四、郭廷以、黃嘉謨、李毓澍的「中國（近代）邊疆史」研究

近代中國的邊疆史地研究之興起與民族主義思潮具有密切關係，本節所討論的郭廷以、黃嘉謨、李毓澍三者對邊疆史學之造詣均深，也都呈現了民族主義的觀點。以下我們將分析他們的著作對中國「固有疆域」和邊域的想像為何？對入侵邊域的各國勢力的認識又如何？

⁸⁵ 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⁸⁶ 此點的思索，是筆者修讀唐啟華教授「北洋外交史」、「民國外交史」的課程中，所獲得的知識啟發，並非筆者的原創思考。筆者補充說明：「國民革命史觀」並非四九年兩岸分裂後的產物，如學者林志宏認為郭廷以撰寫於四零年代的《中國通史稿本》除了吸收具「史料學派」的科學史觀外，亦兼受國民革命史觀的影響。而筆者的另一篇著作，則對蔣廷黻二〇年代的近代史著作進行考察，即發現蔣著亦具國民革命史觀。故此史觀之興起，恐怕與民國創建後，中國民族主義者對近代史的詮釋頗有關聯性。

⁸⁷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192-193.

(一) 中國西北、東北和西南邊疆之研究

為討論方便，本段將分成三部分，依序討論郭廷以、黃嘉謨、李毓澍的近代邊疆史研究：

1. 郭廷以的邊疆研究

郭廷以雖推動中國近代邊疆史的研究，但考察郭氏的邊疆著作，大多以通史、中蘇關係史題材呈現。呂實強彙編的《近代中國的變局》收入郭氏生平未集結成專書的論文，若扣除臺灣史論著，屬於中國邊疆史範疇的僅〈從張騫到左宗棠－西北兩千年的經營〉、〈東北的開拓－明清東北的經營〉二篇，筆者將摘錄原文入表格，並以文字討論之：

表2⁸⁸

	〈從張騫到左宗棠－西北兩千年的經營〉	〈東北的開拓－明清東北的經營〉
中華民族起源	駁斥西來說，並主張：「我們先人的奮力西進，最少已有兩千以上的歷史。中原地區是中華民族的早期活動的中心，進而則作輻射式的發展，分向四方推移。」	中原為中華民族最初的活動地域，由此而分向四方推進……就中尤以東北開拓獨早，成就特著，其與中華民族關係的密切重大...。(401)

⁸⁸ 表格資料均出自：呂實強編、郭廷以撰，〈從張騫到左宗棠－西北兩千年的經營〉、〈東北的開拓－明清東北的經營〉，《近代中國的變局》，377-420。

	(377)	
西北、東北地域與中原的族群和文化關係	<p>1.一部中國史就是民族鬥爭史；西北的遊牧部族，則為中華民族最早的大患。(378)</p> <p>2.秦穆公起於西北，也使中華民族向西北邁進。(378)</p>	<p>1.遠在史前時代，即新石器時代，此一地區（即東北地區）的民族文化與中原同屬一體... (401)</p> <p>2.殷商文化可能源自東北 (402)</p>
中華民族的版圖	<p>1.從張騫使通西域，歷經漢唐元明一千七百餘年的不斷努力，到了清朝，西北區域，遂真正和中國融為一體，成為不可分的一部分。中國地圖輪廓，大致是這個時期所繪成，西北自然包括在內 (389)</p> <p>2.乾隆掌握天山南北路後稱「新疆」，其意為此領土為其新開拓，其實西北乃中國之舊土。(390)</p> <p>3.新疆設省，成為中國永不可分的一部分。(399)。</p>	<p>1.從此東北失去完整，兩年半之間俄人不折一兵，輕易的將東北大半攫去，約等於三十五個臺灣。(413)</p> <p>2.過去三千年中華民族的慘澹經營，奠下了兼顧的根基，化荒蕪的邊徼，為繁盛的地區，視關內各省並無遜色。從此東北在實質上和形式上成為中國不可分的一部分。(422)</p>
民族定義與組成	<p>1.漢帝國漢武帝、張騫打通西域，經營西北始終以爭取中華民族安全為出發點。(382-383)</p>	<p>1.東北的統治者雖非漢族，而文物政教大致仍屬於中原系統，何況女真、契丹同隸中華民族集團，</p>

	<p>2.宋遼金夏對峙時代，遼國耶律大石的西征，屬於中華民族的契丹集團，漢化頗深。(387)</p> <p>3.中華民族的蒙古集團三次西征，掃除中歐間的障礙，促進回教、耶穌教和中國文化的交流。(387-388)</p>	<p>均歸於中國歷史範疇。(406)</p> <p>2.繼金而起的中華民族另一枝，即蒙古。(407)</p> <p>3.康熙二十四年，我軍自瓊瑋前進，經過兩日夜的攻擊，克服失陷三十五年的雅克薩。(411)</p>
民族英雄系譜	<p>1.張騫是我們歷史上的第一位外交家兼探險家(379)、亞洲的亞歷山大成吉思汗，卓越的軍事家速不臺、哲別。(387)</p> <p>2.左宗棠是近代中國傑出人才、偉大人物，偉大在於其對新疆的認識與貢獻。(392)</p> <p>3.左宗棠在西北的地位和成就，可比擬鄭成功在臺灣；劉錦堂則為劉銘傳。(399)。</p>	<p>1.臺灣鄭氏的舊部何祐、林興珠所統率的五百名籐排兵亦參與此次光榮的勝利...。(411)</p>

從表格可知，兩文反映郭氏對中華民族起源、中華民族定義與組成、民族英雄系譜、民族版圖、西北、東北地域與中原的族群和文化關係的思索，而其中有若干值得深究的特徵。第一，中華民族

的起源乃來自中原。第二，中華民族乃由漢族為主構成，但周邊族群若能漢化，或進佔中原地區（自然被漢化）都可算是中華民族的集團成員，如女真、契丹和蒙古族。第三，無論西北、東北地區，凡是中華民族經營過的都屬於其領土範疇。清帝國在西北和東北區域設省統治，更使兩地成為中國不可分割之一部分。第四，西北地區的族群是最早外患；東北地區的少數族群漢化程度較深，且當地文化與中原自古成為一體。第五，代表中原王朝，對邊域經營有貢獻者，無論其是否為漢族，均屬中華民族的英雄。以上五點，可看出郭氏對西北東北邊疆定位的思索，乃以漢族、中原為中心，並強調領土神聖性的史觀。郭著的敘事模式，與「民族主義史學」的幾點敘事特徵十分近似。這些敘事特徵，包括民族起源的故事、建國先祖的神話，以及民族英雄的系譜。⁸⁹因為輝煌的歷史、偉人、榮耀等等，乃是一個民族形成的社會資本。⁹⁰此外，第六，臺灣的鄭氏王朝君臣、清帝國駐台官員劉銘傳等人，是典型民族英雄的代表。雖然兩文均非討論臺灣史，但郭氏經常舉臺灣的人物為例，有刻意連結「新收復邊疆」－臺灣與固有的西北東北邊疆的可能性。刻意連結臺灣與大陸的關係，也符合中國民族主義者的主張。

2. 李毓澍的東北邊疆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研究

近史所內部真正將邊疆史從通史、中外關係史範疇獨立，以主題專著進行深入討論者以李毓澍首開先鋒。在八〇年代前，依時間

⁸⁹ Geoffery Bennington, "Postal politics and the institution of the nation", in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121

⁹⁰ Ernest Renan, "What is a nation?", in Geoff Eley 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52-53

序列《外蒙撤治問題》、⁹¹《外蒙政教制度考》、⁹²《東北中俄國界東段研究》(簡稱《中俄東段》)、⁹³《東北中俄國界北段研究》(簡稱《中俄北段》)⁹⁴共計四本專著問世。事實上,上述專著皆圍繞在中、蒙、日、俄四方在「中國東北地區」的競逐。接下來,我從書中提到的「外蒙問題」談起,李在《外蒙撤治問題》序言談到:

近世帝國主義割裂我疆土,製造傀儡政權,實以俄帝開端,而外蒙「獨立」「自治」,尤為彰明較著之一幕。然後外蒙自動撤銷自治,又證明中蒙之不可分……在此一外蒙「獨立」「自治」與「撤治」的過程中,俄帝之陰謀與北京政府之應付,影響於後日中蒙關係者,皆甚重大。⁹⁵

另一專著《外蒙政教制度考》也指出該書的研究動機:在於當時中國人對外蒙地區的理解,遠不如俄羅斯帝國與外蒙古人士。⁹⁶蓋二專著之研究動機,與近代俄羅斯帝國/蘇聯入侵清帝國/中華民國「外蒙地區」有關。再檢驗二書之內容,作者論及中俄雙方的外交談判時,針對俄方提出的新約,以「俄人貪婪無饜,得寸進尺」來評斷之。⁹⁷以近代國際法為原則的中俄外交事務談判,本以替自己國家謀求最大福祉為旨,李氏卻以極端負面詞彙來形容俄方條件之轉變。最後考察二書的書名,李氏貫以「外蒙」,來稱呼二戰後在國際法上已然獨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這與當時的國際政治與法律的現況背道而馳。從研究動機、漢族中心史觀、對「外蒙地區」的主

⁹¹ 李毓澍,《外蒙撤治問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1)。

⁹² 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

⁹³ 李毓澍,《東北中俄國界東段研究》(臺北: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1977)。

⁹⁴ 李毓澍,《東北中俄國界北段研究》(臺北: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1978)。

⁹⁵ 李毓澍,《外蒙撤治問題》,2。

⁹⁶ 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1。

⁹⁷ 李毓澍,《外蒙撤治問題》,24。

權認可來看，李著的論述貼近中華民國政府的「官方民族主義」。

接著談七〇年代李毓澍對中國東北邊界問題的思考。《中俄東段》、《中俄北段》為「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的「國界問題研究叢書」之二。觀察兩書之架構，《中俄東段》大量參考郭廷以、蔣廷黻的中俄/蘇關係史、近代通史二手資料，加上中方蒐集的中國、俄羅斯一手資料，撰寫「中俄東北國界問題」的歷史背景。內容出現「俄方入侵黑龍江流域，破壞清帝國經營的基礎」、「掠奪中國固有之領土」等描述，反映李氏的東北邊疆研究，乃繼承蔣、郭的中俄關係史的史觀—將清初帝國的疆域看作中國的固有領土。⁹⁸在此史觀下，中俄東界糾紛，源起俄人經常私移界碑、⁹⁹黑龍江水陸界糾紛，源起陸域界俄人私自移動界牌；水域界俄人侵占江中沙洲；結冰期俄人趁機越界、¹⁰⁰呼倫貝爾問題，雖暫時解決，但赤俄仍繼承帝俄的侵略之策、¹⁰¹黑龍江左屯糾紛，則起自：

俄人有計畫的焚毀旗屯，使兩百年中華民族辛勤墾殖的基業，夷為平地，以達其攘站目的。又富對江左華民，聚殺之虞，乘渡追殺，其兇殘暴力，必置華人於死地，不僅慘絕人寰，實已泯滅人性。¹⁰²

上述的推論邏輯，乃一律遵從將清初帝國之疆域視作「固有領土」的前提下，中俄邊界的任一糾紛，都應歸咎於俄羅斯帝國主義的侵略。此外，各篇多半也將「固有領土」遭俄國侵占，歸咎於民初北京政府無能與軍閥亂政。綜論之，作者的問題意識清晰、史實陳述亦少見錯誤，但詞彙運用、推論邏輯、敘事結構則受限於民族

⁹⁸ 李毓澍，〈導論〉，《東北中俄國界東段研究》，1-28。

⁹⁹ 李毓澍，〈近六十年中俄東界糾紛〉，《東北中俄國界東段研究》，95。

¹⁰⁰ 李毓澍，〈黑龍江水陸界的糾紛與重勘〉，《東北中俄國界北段研究》，25。

¹⁰¹ 李毓澍，〈呼倫貝爾問題的再起〉，《東北中俄國界北段研究》，53。

¹⁰² 李毓澍，〈江左旗屯的交涉〉，《東北中俄國界北段研究》，14。

主義的史觀：對外主張：帝俄列強侵略；對內主張：滿清腐敗—使得上述複雜的歷史問題被簡化成「滿清腐敗、俄國野心侵略」的敘事。

中國東北的疆界除俄羅斯帝國外，亦有日本帝國的介入。此因牽涉俄、蒙、日、中與滿州國五方之爭，故有必要先重建三〇年代中國北疆與東北疆域的背景：清帝國下轄的「外蒙古地區」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三次宣布獨立，第一次在1911年，俄羅斯帝國確實有介入蒙古的獨立行動。九一八事變後，1932年日本帝國在中國的滿州地區，扶植滿州國政權。而滿州國的成立，實質上打破日本與俄羅斯雙方在1904年日俄戰爭後共享中國東北利益的平衡局勢。甫成立的滿州國，西界與蒙古人民共和國比鄰，爆發「哈勒哈廟事件的」的領土糾紛。李毓澍以「哈勒哈廟事件的『滿』、『蒙』衝突」¹⁰³來稱呼之。該篇主要論點：將已經宣布獨立於中國的「滿州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之衝突」，視為日本帝國V.S蘇俄兩大強權衝突。上述觀察與當時國際學界的主流觀點並無太大出路，但卻有兩點值得商榷：第一點：通篇使用「滿」「蒙」括號來代稱兩國，篇名以〈偽滿時期日滿和俄蒙的界務衝突〉，反映其認為滿、蒙兩國不具有獨立性，乃完全受制於日蘇兩強權。第二：通篇僅採用日本/蘇聯當時的官方史料，完全不採用蒙古/滿州國內部的史料，將此牽涉四政權的問題，簡化為日俄兩大強權的對立。依舊呈現郭氏將日俄兩國視為主要國族他者的看法。

值得申論的是，從李氏不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性來看，其乃遵循1952年中華民國政府向聯合國提出「控蘇案」¹⁰⁴以來，

¹⁰³ 李毓澍，〈偽滿時期日滿和俄蒙的界務衝突〉，《東北中俄國界北段研究》，53。

¹⁰⁴ 中華民國政府認為蘇聯阻撓其在東北九省恢復主權之努力，並在國共內戰中援助中

企圖在國際法與國際政治否認外蒙獨立的立場。同樣地，郭廷以用「共匪」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遵循國府「一個中國」的方針。從既有的文獻中並無法確定郭、李二人是否真心支持國府的政策？抑或是在當時政治氛圍被迫的選擇？我們只能說，兩人在著作中選擇呈現與官方民族主義同基調的論述，而這樣的選擇，則彰顯兩人著作所受的時代限制。

3. 黃嘉謨的西南邊疆研究

相對於中原西北、東北邊域的非漢族群，西南邊域的非漢族群類別繁多，個別勢力亦較小，在中國史上較少構成所謂的「內憂」，故並未成為近史所邊疆史研究的重點。但早期專攻臺灣史的黃嘉謨，在其生涯晚期逐漸開始轉向西南邊域的研究，1976年出版《滇西回民政權的聯英外交 1868-1874》為其代表作。¹⁰⁵黃討論由回族杜文秀所創建的平南國政權，在對外政策上與西方殖民國家—英、法，以及雲南領土比鄰的緬甸、越南、寮國的複雜關係。¹⁰⁶相較於郭、李二人邊疆史著作鮮明的民族主義話語，黃氏的著作較為中規中矩。但該書結語評價平南國時，指出「若說服英國出兵侵占中國，杜文秀成為歷史上稱臣於契丹的石敬瑭，在英王卵翼下當一個「兒皇帝」；其結果也不一定是中國地方之福」¹⁰⁷。從此也知黃氏仍站在

國共產黨以反叛之，因而違反了條約。1952年，中華民國向聯合國控告蘇聯。聯合國大會以25票贊成，9票反對，24票棄權通過五〇五號決議案譴責蘇聯。此案常稱為「控蘇案」。相關研究可參酌：蕭道中，〈冷戰與中華民國外交：「控蘇案」研究 1946-1952〉，《輔仁歷史學報》17（2006.11），頁471-515。

¹⁰⁵ 朱滋源，〈黃嘉謨〉，《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0（1990.09），94-96。

¹⁰⁶ 黃嘉謨，《滇西回民政權的聯英外交 1868-187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76）。

¹⁰⁷ 黃嘉謨，《滇西回民政權的聯英外交 1868-1874》，250。

維繫中原政權安穩之立場，認為平南國若倚靠英政權之扶植無異於「兒皇帝」。中國民族主義史觀的特徵之一，便是吸收傳統漢人史家中原正朔的立場，否定處於邊域、而往往是非漢族群「脫離中原王朝治理」的合法性。¹⁰⁸

（二）臺灣史研究

1949年以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對於臺灣史著墨較少，多半是在談到「乙未割臺」時才會談到，較少成為一個獨立的專題論文或研究領域。郭廷以在1940年代即已撰寫過臺灣史的專著，黃嘉謨則是郭氏門下最早關注臺灣史的學者。從中國近代史的視角切入，「臺灣」乃為近代以來重要的海疆地區，1895-1945年間割讓給日本帝國、1945年重歸中國統治、1949年後又具有「民族復興基地」的重要性。因此，「臺灣史」的書寫乃具有彰顯現實政治關懷的意義，以下考察郭黃兩者如何透過民族主義史觀，企圖讓「歷史研究」與「政治關懷」之間產生對話。

1. 郭廷以的臺灣史研究

在臺灣史著作頗豐，有數篇1950s-1970s的文章，收入《近代中國的變局》—〈臺灣的開發與現代化（1683-1891）〉、〈甲午戰前的臺灣經營——沈葆楨丁日昌與劉銘傳〉、〈臺灣的早期經營（230-1683）〉等文。上述三文均可在《臺灣史事概說》中找出對應的章節，觀點也差異不大，應可視為改寫版，以下分析該書。專書《臺灣史事概說》，從1954-1996年四十年間，共有八版之多，該時段內同兩類書籍

¹⁰⁸ 王柯，《多民族國家·中國》（東京：岩波書店，2005），5-6。

影響力均遠不如該著。¹⁰⁹因此，陳儀深、歐素瑛、林柏維等人討論郭氏的臺灣史思想均以該書為核心材料，並分別指出該書對臺灣早期史實模糊、¹¹⁰因大中國思想的影響，而考證武斷、¹¹¹預設理論和史實實踐層次合一¹¹²等特徵。筆者考察《臺灣史事概說》¹¹³的特定內容：「三國時代的夷州、隋代琉球＝臺灣」（3-4）、指控荷蘭將臺灣從「中華民族手中奪走」（24）、主張鄭氏驅逐荷蘭人之行動為「收復漢人故土」（34）、評述臺灣漢人和原住民關係時，主張較高的中華文化的傳入，確實有助「番人建設」（113）等觀點，這些觀點具有如下特徵—溯及延長民族歷史、近代恥辱失土，而後光榮收復失土、漢文化較其它民族文化高等，這些特徵其實與郭廷以撰寫中國近代史的民族主義史觀十分接近。而郭著將「荷蘭」V.S「鄭成功」和「日本」V.S「蔣介石」做對照，強調「恥辱失土V.S光榮復土」的關係，實有「引用古史以呼應現實政治」的企圖。

2. 黃嘉謨的臺灣史研究

繼承郭廷以地臺灣史研究為黃嘉謨先生，《甲午戰前之臺灣煤務》¹¹⁴為黃氏第一本史學專書著作，其書名似乎屬於社會經濟史類別的書籍，但內容實則將重點置於清帝國英美日法諸國對臺灣採礦權的競爭，與此中引起的國際糾紛。書中雖以史料考據為本，但史觀仍以中國民族本位視角，將諸國爭取採礦權的行動，視為「英國

¹⁰⁹ 歐素瑛，〈郭廷以的臺灣史理論與實踐——以「臺灣史事概說」一書為例〉：61-63。

¹¹⁰ 林柏維，〈琉球＝臺灣？〉，《臺北文獻》134（2000.12）：61-87。

¹¹¹ 陳儀深，〈從邊疆史到臺灣史：世變下郭廷以史學的一個側面〉：12-13。

¹¹² 歐素瑛，〈郭廷以的臺灣史理論與實踐——以「臺灣史事概說」一書為例〉：61-87。

¹¹³ 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臺北：正中書局，1954）。

¹¹⁴ 黃嘉謨，《甲午戰前之臺灣煤務》。

覬覦」、「法軍攫用」、「美商私典」。¹¹⁵書中對諸國的描述如下：福建巡撫徐宗幹「在道光末年分巡臺灣道期間，早知英人慣常覬覦雞籠煤礦...向認為英人覬覦臺灣煤炭，其牟利的企圖，真是無微不入...」¹¹⁶《美國與臺灣：一七八四至一八九五》¹¹⁷中，黃嘉謨雖根據史料，推論美國給予日本侵台和殖民臺灣不少幫助，但也不免在結語以道德似的訓誡「戰事結束後，臺澎歸還中國，終於糾正了過去美國的謬誤觀念與行為。」¹¹⁸該書可放在「邊疆史/臺灣史」脈絡考察外，也可說是近史所接受福特基金會補助期間對「中美關係史」的重視。該書對美國在清代涉台行動的評價較低，但對於二戰後美國協助中華民國取得臺灣的治理權則大加讚譽，與冷戰時期下「華美同盟」的政治氛圍頗為契合。由黃氏的著作觀察，即便在資料蒐集與論證過程均持平以對，但民族主義的話語仍可能展現在「陳述事實的方式」，以及其敘事的結構的安排之中。

五、結 語

根據本文考察的結果，可做出以下數個結論，以回應前言提出的問題：

（一）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近代以降中國國力衰弱、領土遭受割裂和族群關係緊張，再加

¹¹⁵ 黃嘉謨，《甲午戰前之臺灣煤務》，1-2、9。

¹¹⁶ 黃嘉謨，《甲午戰前之臺灣煤務》，29。

¹¹⁷ 黃嘉謨，《美國與臺灣：一七八四至一八九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66）。

¹¹⁸ 黃嘉謨，《美國與臺灣：一七八四至一八九五》，250。

以歐美民族主義思潮傳入，使得部分知識分子開始思索「帝國主義下近代中國之命運」——「中國近代史」此學術領域遂開始有了基礎。尤以對（一）近代歷史變遷提出整體思考的「通史」、（二）剖析中外政治得失的「外交史」、（三）從邊疆史地研究蛻變而來—重視中國邊疆地區的族群關係、邊疆與外國勢力的「邊疆史」等三個次領域，處理的議題與中國外交內政「現勢」密切相關，故梁啟超、劉彥、蔣廷黻等中國近代史的開創者，均於此類作品中寄寓對國家、民族和時代之關懷。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處在「冷戰—內戰」雙元框架下，民族意識中的「主要他者」，國際上從日本轉為蘇俄，「國內」的中共亦排除於民族共同體之外，此點也反映在當局不僅以新修《出版法》獎勵邊疆研究，更在缺乏「帝俄侵略中國史」專責機構下，同意於中研院增設「近史所」。此外，近史所草創期接受美國的經濟援助，也使得其研究方向受到美方在冷戰中的利益需求，而將中外關係史納為重點發展領域之一。因此，郭廷以、王聿均、黃嘉謨、李毓澍等草創期的專任研究員，在臺灣延續了具有民族主義史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並以近代邊疆史、中外關係史為專攻領域。

（二）中國民族主義史觀下的「中國近代史實」

在民族主義史觀下，郭廷以、李毓澍、王聿均、黃嘉謨「中國近代史實」之書寫有何特徵？第一，對中國「固有疆域」的堅持與想像：在郭、李二人的敘述中，可知「固有疆域」具有兩個定義：其一，以《尼布楚條約》簽訂前的清帝國版圖為固有疆域，而這樣的界定出現在「近代中蘇外交史」、「近代東北邊疆史」的題材。蘇

俄作為國府撤退來臺後政治外交上的「國族他者」，中蘇雙方具有爭議的領土都被郭、李歸為「中國的固有領土」，藉以突現蘇俄的負面形象。其二，中華民國的邊疆地區的領土，如東三省、新疆和臺灣，則是「自古以來即經營過的土地」，此界定則顯示在「邊疆通史」的題材。那些領土雖然多半在清帝國以後才歸中國管轄，但國府當局卻以漢人/中國人在古代曾在那邊活動，來強化領有該領土的正當性。從上可知，雖然兩種定義不同，但實際都為了鞏固「現代」民族國家之需求，而回到「過去」的經驗中尋找可聯繫的「歷史記憶」。

第二，「國族核心」與「國族他者」的形塑：從邊疆史的題材，可知郭廷以等人認定的「中華民族」是以「漢族」為核心的架構，其他族群只能透過「漢化」歸入此民族共同體。國族他者的形塑，對於蘇俄是最嚴詞批判。對越南、韓國、日本等曾向中國朝貢過者，強調對它們的保護和影響，以凸顯中國在「過去的偉大」，並提出日方的背叛是「近代的衰弱」主因。本文四位研究對象，在敘事手法和使用詞彙上有何特徵？就敘事手法而言，四位均大量使用「受害者敘事」框架來陳述史實，而受害者/被侵略者均是「中國」，加害者/侵略者則是其它國家。此框架運用的最頻繁是在於中蘇、中日關係的議題上，從中也可看出「冷戰－內戰」雙元架構下的主要國族他者為蘇俄。例如，敘事結構幾乎都呈現「痛斥日本，最後寬恕日本；痛斥蘇俄，誓言消滅」的架構。而在詞彙使用上，惡毒、凶狠、忘恩負義等具有高度情緒性詞彙，則普遍出現於四人的著作中。「受害者敘事」、「情緒性詞彙」的大量使用，讓他們的著作呈現更鮮明的民族主義史觀。

（三）「官方中國民族主義」與「學術知識的生產」

前兩點討論中國民族主義思潮，與中國近代史興起的關聯性，以及民族主義史觀下的史實如何書寫。但從李毓澍、郭廷以的個案顯示，兩者對已正式建國、且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的「蒙古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使用「外蒙古地區」和「共匪」。若單純從「中國民族主義」的史觀來解釋「詞彙的選用」恐怕過於簡化，因為立場親近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雖然他們也抱持中國民族主義情懷，但就不太可能以「外蒙古」、「共匪」兩個詞彙，來稱呼蒙古人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郭廷以等人著作中「詞彙的選用」，與臺灣當局的官方中國民族主義可能有關。蔣介石總統執政時期，官方一向主張反攻並收復失土，「失土」則包含中國大陸各省與外蒙古地區，這也成為「官方民族主義」對近代史的主張——從部編版的歷史與地理教科書之內容即可觀察。郭廷以等人若未能遵循官方民族主義的立場，輕則停刊、查禁，重責判刑。¹¹⁹因此，「官方中國民族主義」不僅對「非中國民族主義」有所限制，同時也限制其他主張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以不同的角度來思索與建構「想像共同體」的機會。

¹¹⁹ 戰後的「報刊圖書審查標準」，當局以違反（三民）主義、危害政府、洩漏軍事機密、妨害社會風氣等四點作為可能取締的標準。主張蒙古和中國大陸非「中華民國」領土至少就觸犯了違反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危害政府兩項。詳見：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臺北：稻鄉，2005），221-222。

徵引書目

(一) 檔案

1. 〈中美及中加文教雜卷(五)〉，《外交部》，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50207-0007。

(二) 學術專書

1. Anderson, Benedict、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2010。
2. Fairbank, John K., Chinabound: A Fifty 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82.
3. Smith, Anthony,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7.
4. Smith, Anthony,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2001.
5. Wehler, Hans-ulrich著; 山口定等譯，《近代化理論と歴史学》，東京：未來社，1977。
6. 青木富太郎，《東洋學の成立とその發展》，東京：瑩雪書院株式會社，2013。
7. 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主編，《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任重道遠全院篇》，臺北：中央研究院，2008。
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臺北：中央研究院，1985。

9. 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從優林到越飛》，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63。
10. 王柯，《多民族國家·中國》，東京：岩波書店，2005。
11. 王學典主編，《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1900-1949）》，卷1，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12. 呂實強編、郭廷以撰，《近代中國的變局》，臺北：聯經，1987。
13. 李毓澍，《外蒙撤治問題》，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61。
14. 李毓澍，《外蒙政教制度考》，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65。
15. 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66。
16. 李毓澍，《東北中俄國界東段研究》，臺北：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1977。
17. 李毓澍，《東北中俄國界北段研究》，臺北：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1978。
18. 何秋濤，《湖方備乘》，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19. 姜義華、武克全主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科學·歷史學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0. 宮明編，《中國近代史研究述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
21. 章永俊，《鴉片戰爭前後中國邊疆史地學思潮研究》，合肥市：黃山書社，2009。
22. 郭廷以，《俄帝侵略中國簡史》，臺北：文海，1952。
23. 郭廷以，《中華民族發展簡史》，臺北：國防部總政治部，1953。
24. 郭廷以，《臺灣史事概說》，臺北：正中，1954。
25. 郭廷以，《中國近代史概要》，臺北：青年，1954。
26. 陳三井主編，《走過憂患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臺北：中央研究院，1985。

27. 傅斯年，《東北史綱·初稿》，北平：傅斯年出版，1932。
28. 黃嘉膜，《甲午戰前之臺灣煤務》，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61。
29. 黃嘉膜，《美國與臺灣：一七八四至一八九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66。
30. 黃嘉膜，《滇西回民政權的聯英外交 1868-1874》，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76。
31.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戊戌政變記》，卷1，上海：中華書局，1936。
32.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卷2，上海：中華書局，1936。
33.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盾鼻集》，卷9，上海：中華書局，1936。。
34. 張海鵬、龔雲，《中國近代史研究》，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35. 張朋園，《郭廷以費正清章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臺北：中研院近史所，1997。
36. 孫喆、王江，《邊疆、民族、國家：《禹貢》半月刊與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邊疆研究》，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
37.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以《史地學報》、《禹貢半月刊》為中心的探討》，臺北：東大圖書，1995。
38. 唐啟華，《被「廢除不平等條約」遮蔽的北洋修約史（1912-192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39. 楊秀菁，《臺灣戒嚴時期的新聞管制政策》，臺北：稻鄉，2005。
40. 潘光哲，《天方夜譚中研院：現代學術社群史話》，臺北：秀威資訊，2008。
41. 潘懋元、劉海峰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42. 魏源，《聖武記》，長沙：岳麓書社，2004。

43. 劉彥，〈《中國近時外交史》〉，上海：華昌書局，1914。
44. 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2002。
45.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長沙：商務印書店，1938。
46. 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三) 論文

1. Bennington, Geoffery, "Postal politics and the institution of the nation", in Homi K. Bhabha eds,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2. Renan, Ernest, "What is a nation? ", in Geoff Eley and Ronald GrigorSunyeds,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王柯，〈從「勤王大清」到「滿蒙獨立」——川島浪速的「滿蒙獨立運動」〉，《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5），129-183。
4. 王爾敏，〈漫談郭廷以與中國近代史之學術建樹〉，《漢學研究通訊》22.3（總號87）（2003.08），35-44。
5. 朱法源，〈黃嘉謨〉，《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0（1990.09）：89-97。
6.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上）〉，《歷史月刊》4（1990.06）：135-146。
7. 林志宏，〈蔣廷黻、羅家倫、郭廷以：建立「科學的中國近代史」及其詮釋〉，《思與言》42.4（2004.12）：41-81。
8. 林柏維，〈琉球＝臺灣？〉，《臺北文獻》134（2000.12），61-87。

9. 郭廷以，〈臺灣的國際關係——一個歷史的說明〉，《新中華》，復刊6.6（1948.3），6-32。
10. 陳儀深，〈從邊疆史到臺灣史：世變下郭廷以史學的一個側面〉，《思與言》48.4（2010.12）：1-22。
11. 楊瑞松，〈打造共同體的新仇舊恨：鄒容國族論述中的「他者建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7（2012.05）：43-71。
12. 歐素瑛，〈郭廷以的臺灣史理論與實踐--以「臺灣史事概說」一書為例〉，《臺北文獻》134（2000.12）：61-87。
13. 蔣廷黻，〈最近三百年來東北外患史〉，《清華學報》8.1（1932.12），1-70。
14. 蕭道中，〈冷戰與中華民國外交：「控蘇案」研究1946-1952〉，《輔仁歷史學報》17（2006.11），頁471-515。

（四）口述訪談資料

1. 沈懷玉主訪，〈王萍女士訪問記錄〉，收入於陳儀深、黃克武等訪問，《郭廷以門生故舊憶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4），128-130。
2. 潘光哲主訪，〈王爾敏先生訪問記錄〉，收入於陳儀深、黃克武等訪問，《郭廷以門生故舊憶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4），178-188。
3. 潘光哲主訪，〈陳存恭先生訪問記錄〉，收入於陳儀深、黃克武等訪問，《郭廷以門生故舊憶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4），309-310。
4. 陳儀深主訪，〈王聿均先生訪問記錄〉，收入於陳儀深、黃克武等訪問，《郭廷以門生故舊憶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4），39-40。

(五) 網路資料

1. 《出版法》全文檢索，參考自：「立法院法律系統」：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131:1804289383:f:NO%3DE02402*%20OR%20NO%3DB02402\\$\\$11\\$\\$\\$PD%2BNO](http://lis.ly.gov.tw/lgcgi/lglaw?@131:1804289383:f:NO%3DE02402*%20OR%20NO%3DB02402$$11$$$PD%2BNO)，點閱日期：2015年1月5日
13:57
2. 〈王聿均〉，「臺灣文學網」：參考自：
http://tln.nmtl.gov.tw/ch/m2/nmtl_w1_m2_c_2.aspx?nm=%E7%8E%8B%E8%81%BF%E5%9D%87，點閱日期：2015年1月14日 15:35。
3. 〈黃嘉謨、李毓澍〉，「國家圖書館全國書目查詢系統」：
<http://nbinet3.ncl.edu.tw/>，點閱日期：2015年1月14日 16:44。

(六) 報紙

1. 〈總統期勉學術界人士負起復興民族文化艱鉅任務鞏固倫理道德重建國家〉，《聯合報》（臺北），1958年4月11日，第1版。
2. 〈呂學樟嗆廢中研院 黃國昌轟狂妄闖尾〉，《自由時報》（臺北），2014年05月13日。參考自：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778515>，點閱日期：2015年01月11日 08:26。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under Chinese Nationalism: focus on Kuo Ting-yee, Wang Yu-chun, Lee Yu-shu and Huang Chia-mo

Su, Wei-sin

Master of Liberal Arts, NCCU

This academic essay analyze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tudy of MCH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840-1949)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after KMT government retreated to Taiwan. Academia Sinica established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IMH) in 1955, and formally established in 1965. IMH’s played a leadership in the field of MCH in Taiwan, i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 and “the mission of revival of Chinese nation”. Because of IMH’s importance, the study chose four scholars -- Kuo Ting-yee, Wang Yu-chun, Lee Yu-shu and Huang Chia-mo, who represente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IMH. This article circled on three question groups: First, why did scholars emphasized the Chinese diplomacy history and frontier history? Second, how did those scholars “image”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under the Imperialism? Which historical events and figures did they critics or admire? Finally, did the four scholars’ discourse have any relation to official Chinese Nationalism? My stud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of those questions, and attempt to answer and explain their meaning.

airiti

· 174 ·

蘇維新

**Keywords: Chinese Nationalism,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in Academic Sinica**